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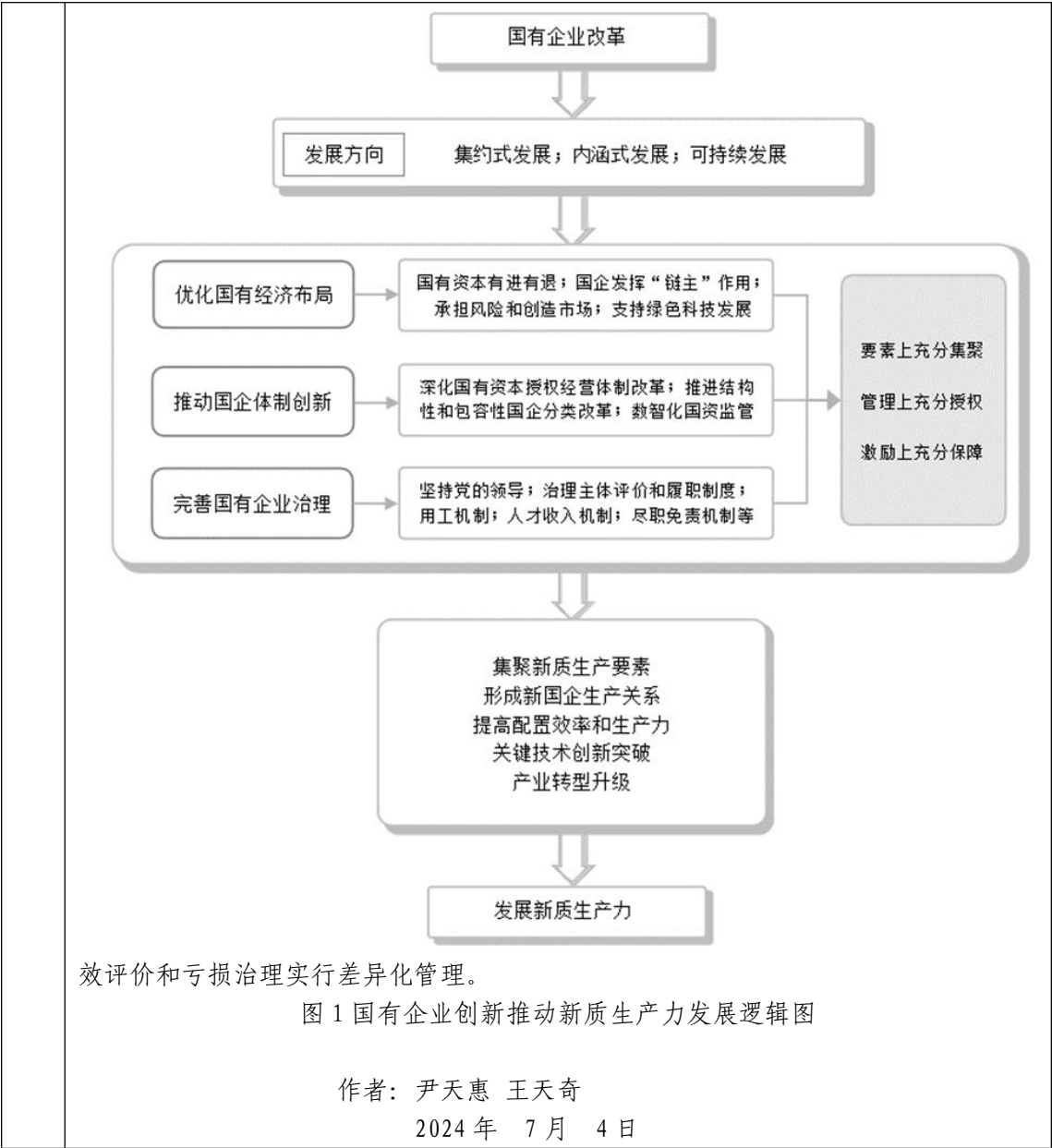
《金融市场研究》专家审稿单

稿件篇名：向“新”而行：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	
外 审 意 见	《向“新”而行：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一文选题意义重大，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论证新质生产力与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耦合关系；第三部分提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重点为集约化发展、内涵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第四部分说明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包括国资监管体制约束、企业内部治理约束以及创新链和产业链竞争力不足等；第五部分分析促进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化路径；第六部分总结全文。论文整体逻辑较为清晰、结构相对完整、写作规范流畅。但是，鉴于论文还存在以下问题，建议修改后再审。 具体而言，建议论文围绕着以下要点深入论述。 第一，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对于国有企业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以论述。具体而言，在所有制方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无疑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但是其所需要发挥的作用与民营企业具有怎样的区别，对此需要深入论述。论文要避免泛化的讨论，否则将导致针对性不足，即把文中某些部分的国有企业替换成民营企业也可以说得通，则无法体现出二者地位与作用的差异。 第二，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围绕国有企业需要重点论述以下问题，即如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遴选一批有潜力有基础的初创期企业，在管理上充分授权、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上充分保障，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打造未来“独角兽”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第三，在国有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要注意继续贯彻分类改革策略，针对不同业务领域的国有企业，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与目标要求，切实做到“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 具体的修改建议如下： 在论文第二部分，结合基本经济制度，补充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并且说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区别及关系。 在论文第四部分，重点围绕国有经济布局、国资监管体制、国企深化改革三个方面论述现实约束。 在论文第五部分，严格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约束，提出必要的对策，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实现集约化发展、内涵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且突出如何贯彻分类改革的思路。 以上建议供参考。 2024 年 6 月 19 日
作 者 回 复	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基于上述修改意见，对文章做出如下修改，具体修改内容，我们已经在修订模式版中进行了标注。 审稿意见 1：在论文第二部分，结合基本经济制度，补充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并且说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区别及关系。 本文已在第二部分重新修改国有企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修改内容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崛起，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持续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以良性竞争和互助合作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有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框架一方面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支柱地位，另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在委托代理和预算软约束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担负起将我国重大经济目标统一为有机整体的重要任务（石明明和张小军，2023；何瑛和梁湘钊，2024）。我国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期，因制度不完善和缺少有效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政府部门倾向于将国有企业定位为逆周期完善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调节工具，使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性功能，这要求国有企业在投资方向和资源配置上更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重点参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调节的关键领域。大量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具有宏观效率优势（李书娟等，2021；Fang et al., 2023），证明这种政策取向与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内在需求相一致，能够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灵活性较高，在资源配置、市场响应、创新能力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下，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需要弥补公有制经济的微观效率不足，通过合资共建、增资扩股、整合并购等与国有企业深度对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价值创造格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平衡是我国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杨瑞龙，2022）。这种双轨并进的经济模式突出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国有经济产业布局长期呈现“垂直生产结构”，即国企集中于上游行业，民企集中于下游（陈小亮和陈伟泽，2017；王勇，2017）。在这种生产结构下，国有企业能够通过中间品满足下游民企产品需求，通过供给和价格调节机制实现对民企的正外部性（陈金至等，2023）。 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应更好地配合国家战略，凭借其资源集中、管理规范和风险承担能力优势，在基础研究与战略产业发展中承担起对长周期、高投入和高风险项目的支持责任，如特高压输电、北斗导航系统等，增加国有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的政策设计，发挥产业链“链长”职能作用（赵晶等，2022）。民企则通过市场化运作与创新机制实现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的拓展。二者协同共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创新效率，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合力和韧性。尤其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挑战时，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尤为重要，不仅能为民营企业提供技术合作和产业链上的支持（武丽娟等，2016），也能缓解市场非理性情绪，激发市场科技创新热情，助力我国形成更加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持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国有企业推进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调整国有企业生产关系适配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践层面即通过完善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构建一批现代化新国企。这些企业应当具备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能够以适应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向新型生产关系转变，形成企业技术创新和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骆桢，2024），让创新资源要素以增强国有企业

	“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方向高效配置，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优势，最终成为适应并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在外部治理层面，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调整体现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多主体协同作用。在内部治理层面，国有企业应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能力。通过外部和内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积极促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激发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要促进产业发展，并在产业发展中不断迭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目的是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构建我国创新链产业链竞争优势，解决传统要素和成本竞争优势削弱带来的不良影响（徐建伟，2023），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国有企业迫切需要进入和发展的行业。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下，国有企业需要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解放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体现我国公有制显著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积极发挥出在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卡脖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和保障能力，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审稿意见 2：在论文第四部分，重点围绕国有经济布局、国资监管体制、国企深化改革三个方面论述现实约束。 本文已将第四部分修改为以下三个部分：国有经济布局待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竞争力有待提高；国资监管体制约束，资源集聚能力与配置效率不足；国企深化改革瓶颈，内部治理效能与经营机制短板。 增加关于国企分类治理的论述，具体内容为：部分地方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较为简化，国企分类治理能力不足，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降低不显著。目前国有企业从业务角度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商业类进一步细分为市场竞争充分的商业一类，以及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商业二类，但这种分类标准仍然较为宽泛，难以设定科学合理的分类监管机制。虽然中央企业已经根据分类改革要求，推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分类改革和分类考核新方法，但地方国企因数量和规模较大难以实施精细化分类管理，依然存在社会功能难剥离、职员冗余等问题阻碍创新活动的开展（王彩萍等，2024）。 审稿意见 3：在论文第五部分，严格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约束，提出必要的对策，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实现集约化发展、内涵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且突出如何贯彻分类改革的思路。 本文已在第五部分提出一一对应的对策建议，并依据修改内容重新绘制图 1。主要修改内容为： 1. 在遵循国家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正在稳步从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从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一转变的实现既彰显了国家战略决策的精准性，也体现了国有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适应力和引领力。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主要体现于国有资源的重新配置。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作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国有资源重要载体，需要持续推进战略性转变，持续推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运作模式，同时督促国有企业担当起产业链“链长”责任，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风险控制和绿色引领的核心职责，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2. 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以动态视角建设一个具有结构性和包容性的中国特色国资监管体制框架。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础与前提（李维安，2014），通过分类改革明确不同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功能特征和发展目
--	---

标，明确各类国企“社会功能”和“企业功能”的界限，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所有制改革和“因企施策”奠定基础（王彩萍等，2024）。在当前发展阶段，部分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难以从国有企业中彻底剥离，而且国有企业的公共属性也要求其必须承担公共任务。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例，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战略目标赋予其成为“耐心资本”的重要责任，这与资本追求增值的属性存在天然矛盾，为了调和政治与经济目标间的矛盾，需要对其实施具有包容性的中长周期考核机制，减少其短期定量化硬性考核压力。因此，因企施策适用于大部分国企，其关键在于清晰界定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和非社会功能，进而有利于国资监管部门从“企业-业务-功能”三个维度开展结构性监管，建立一套具有现实性和可承受性的国有企业分类监管体系。此外，随着技术迭代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可能出现更迭变换，特别是在新兴技术不断涌现的情况下，行业及领域的重要性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动（石明明和张小军，2024），国有企业分类也需要随着市场条件及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建立动态化国有企业分类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包容性国资监管体制框架。 3. 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打造现代新国企。 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水平是打造现代新国企的必然选择，重点在于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融合。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新质劳动力培养和配置效率，形成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必须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将党的领导内嵌于公司治理整体架构之中。坚持党管人才，发挥党在选人用人、人才管理、人才培养规章制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对人才的理想信念教育，以讲政治、重实干、重绩效为导向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技术发展规律的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机制。 第二，完善对党委（党组）、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的评价办法和外部董事履职制度。根据“三重一大”决策权责清单、董事会授权清单，明晰和落实国企各治理主体职责，坚决推进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深度结合。明确外部董事工作报告制度和工作例会制度，保障外部董事知情权，尤其在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企业，要打通外部董事信息资源渠道，确保其有效履行决策参与和风险评估等职责。 第三，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一企一策”提高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活力与效率。鼓励竞争性国企推行契约化管理、竞聘上岗和末位调整退出的市场化用工机制，加快形成一批现代化新型国企。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通过数智化技术分析战略投资者匹配度和协同度，选取有比较优势的投资者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运用市场化混改基金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混改的路径，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新常态。 第四，持续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完善激励创新的收入制度设计。针对科技创新制定更优激励效果的考核成果兑现机制，加大收入分配向关键岗位、一线岗位、高素质专业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倾斜力度。针对骨干员工利用好虚拟股权期权、分红奖励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审慎实施对管理人员的分红激励政策，加强对管理人员的专业评估体系和考核机制，部分技术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和领域的国企在选拔领导时，需要以专业测试、案例分析等方式评估管理人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扩大对产业工人的培训投入，鼓励国有企业高级技工实行“传帮带”人才培育机制，并对积极落实的高级技术工人给予特殊“教育”奖励，尽快培养出一大批与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配套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加快完善尽职免责机制，尤其是重点领域的专项投资和科技研发应加快制定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尽职合规免责事项清单，对绩
--



外审评议和作者回复（若有）是文章的过程性材料，隐名后的有价值讨论可公开。如研究中使用该内容，辛苦您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出处。

新质生产力与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耦合关系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核心技术的突破是生产力发生“质变”的关键。无论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还是实现路径来看，科技创新都嵌套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全过程中，并深刻支撑生产力实现“质变”（刘丸源和季雷，2024）。新科技的发明是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只有应用新科技才能产生新质生产力，进而发展新产业（洪银兴，2023）。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两种科技创新形式分别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集成创新。第一，颠覆性技术创新是由“0”到“1”的“无中生有”，正如四次工业革命中“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数智化”的演变过程。每一次创新技术的出现都颠覆了传统创新路径，并带来新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周文和许凌云，2023）。我国当前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深地深海空天科技等颠覆性技术，以此推动新动能、新产业、新模式不断发展。第二，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基于颠覆性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和其他资源禀赋，从系统性和协同性视角出发，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再创新，并在此创新过程中迸发强大的新质生产力（洪银兴，2024）。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是在传统汽车产业基础之上结合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诸多新技术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我国集成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典范。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2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2 041 万辆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发展需求越来越旺盛。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还会持续激发技术创新动能，通过产学研结合解决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难点，成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

但科技创新并不能作为“独立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换句话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集中培养具有突破意识和敬业精神的科研团队和学术梯队，并建立具有创新思维包容性和基础研究激励性的环境，为获取重大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制度环境。相比于颠覆性技术创新，集成创新更强调劳动力的复合专业能力，将颠覆性创新的技术和知识商品化、产业化，这就需要重点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具有商业整合能力和金融资源运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此外，基础研究还需要自动化制造设备、人工智能设备等新型基础设施，这就需要长期稳定投入资本等生产要素，而且研发投入产出效率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社会资本可能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引导规范非公资本（张开 等，2023），也需要国有资本承担起创新投资重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周文和李吉良，2024），驾驭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性。

（二）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总体来看，经济制度能够承担生产关系职能，完善经济制度和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调整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孟捷和韩文龙，2024；周文和李思思，2019）。实践中，政府通过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主动突破政策障碍及体制机制的短板和枷锁，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路径（尹俊和孙巾雅，2024）。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政府主导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代表性案例。比如股权多元化改革通过开放一部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产权，让部分国有企业实现市场化；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管

¹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0 万辆[EB/OL].(2024-01-11)[2024-05-01].<http://www.news.cn/20240111/204959bbb6b14754baf769aa66656444/c.html>.

体制改革从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入手，推进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强化国有资产集中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改革是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和个人关系的重要形式，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管理能力对社会生产力的适应性。在国有企业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国有资产规模大幅增加，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彰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凸显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是特殊机构对重大任务的执行和完成，而新时代下重大任务已与历史时期有所差别，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机构的要求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形成以国家牵头、各主体协同合作的“体制”（路风和何鹏宇，2021）。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是衔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主体，对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有重要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以国资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突出国资国企作为资源配置重要主体地位，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组织方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除新质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和限制。

（三）国有企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持续推进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国资国企的深化改革，以良性竞争和互助合作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有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框架一方面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支柱地位，另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在委托代理和预算软约束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担负起将我国重大经济目标统一为有机整体的重要任务（石明明和张小军，2023；何瑛和梁湘钊，2024）。我国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期，因制度不完善和缺少有效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政府部门倾向于将国有企业定位为逆周期调节工具，使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承担更多政策性功能，这要求国有企业在投资方向和资源配置上更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重点参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调节的关键领域。大量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基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具有宏观效率优势（李书娟等，2021；Fang et al., 2023），证明这种政策取向与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内在需求相一致，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灵活性较高，在资源配置、市场响应、创新能力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下，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需要弥补公有制经济的微观效率不足，通过合资共建、增资扩股、整合并购等与国有企业深度链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价值创造格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平衡是我国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杨瑞龙，2022）。这种双轨并进的经济模式突出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国有经济产业布局长期呈现“垂直生产结构”，即国企集中于上游行业，民企集中于下游（陈小亮和陈伟泽，2017；王勇，2017）。在这种生产结构下，国有企业能够通

过中间品满足下游民企产品需求，通过供给和价格调节机制实现对民企的正外部性（陈金至 等，2023）。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应更好地配合国家战略，凭借其资源集中、管理规范和风险承担能力优势，在基础研究与战略产业发展中承担起对长周期、高投入和高风险项目的支持责任，如特高压输电、北斗导航系统等，增加国有资本投入和创新激励政策设计，发挥产业链“链长”带动作用（赵晶 等，2022），完善上游产业布局，扩大上游高端产能以带动下游需求升级。民企则通过市场化运作与创新机制实现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的拓展，实现国企民企共建共享，提高整体创新效率，展现出更强大的合力和韧性。尤其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挑战时，国有企业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尤为重要，不仅能为民营企业提供技术合作和产业链供应链支持（武丽娟 等，2016），也能缓解市场非理性情绪，激发市场科技创新热情，助力我国形成更加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持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国有企业推进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调整国有企业生产关系适配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践层面即通过完善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构建一批现代化新国企。这些企业应当具备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能够以适应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向新型生产关系转变，形成企业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的宏大愿景（骆桢，2024），让创新资源要素向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高效配置，²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优势，最终成为适应并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在外部治理层面，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调整体现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多主体协同作用。在内部治理层面，国有企业应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能力。通过外部和内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积极促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激发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要促进产业发展，并在产业发展中不断迭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目的是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构建我国创新链产业链竞争优势，解决传统要素和成本竞争优势削弱带来的不良影响（徐建伟，2023），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国有企业迫切需要进入和发展的行业。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下，国有企业需要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解放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积极发挥在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卡脖子”技术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和保障能力，体现我国公有制独特优势。

²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